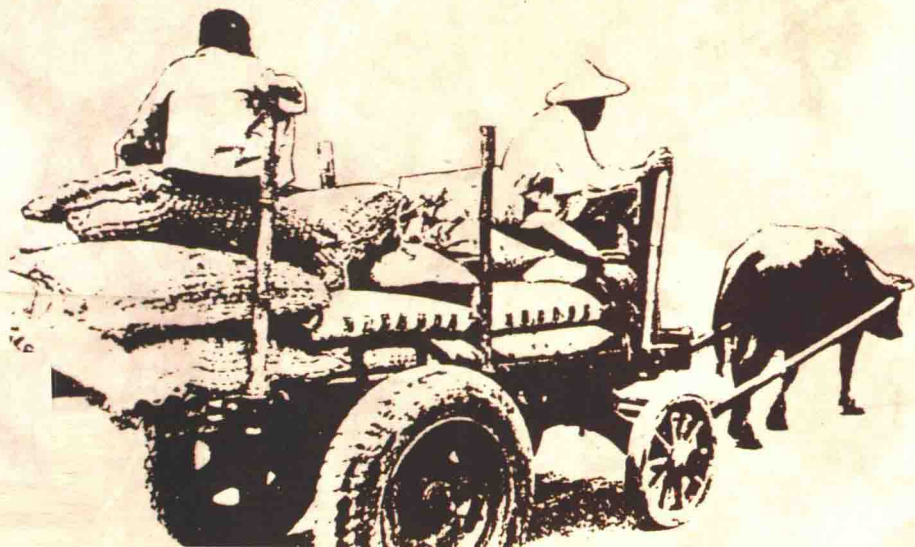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33)

中國農村 復興聯合委員會 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訪問·紀錄：黃俊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33)

中國農村 復興聯合委員會 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訪問·紀錄：黃俊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研究院口述歷史叢書(33)
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出版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訪 問 黃 俊 傑
紀 錄 黃 俊 傑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 址 中華民國 臺北市 南港
定 價 平裝本新臺幣 300 元 美元 12 元
精裝本新臺幣 350 元 美元 14 元
國 外 訂 購 另 收 郵 費
劃 撥 帳 號 臺北 郵 政 1 0 3 4 1 7 2 - 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 話 (02)7824166 轉 5109
承 印 者 永 裕 印 刷 廠
地 址 臺 北 市 西 昌 街 168 號

(精) ISBN 957-9046-95-6

(平) ISBN 957-9046-96-4

序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這部書，是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黃俊傑教授近兩年來訪問農復會早年工作同仁，所答覆的訪問紀錄。現在乘結集成書出版的機會，我們謹就這項口述歷史訪問工作的緣起及其意義略作說明。

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對於光復後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發展經驗的研究，都不能忽略一九四九年開始的土地改革及其後續的農業發展。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助於農業生產力的提昇，也帶來了穩定的農村社會秩序，奠定了台灣農村復興的基礎。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農業與農村的復興，則又促進了六〇年代中期以後工業化的進展。在光復後「台灣經驗」的發展過程中，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所推動的各項工作，發揮了重大的影響，貢獻良多。

關於農復會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這項工作的進行，是緣起於森中與黃教授之間的一次談話。黃教授近年來進行農復會歷史的研究，蒐集了大量的資料，有一次黃教授與森中談到農復會歷史，森中就鼓勵黃教授進一步對當年參與農復會工作的同仁，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以便與農復會的工作報告、檔案及其他文獻互相補充。於是，黃教授就以兩年左右的時間進行這項工作，由資深之農復會先輩多人，或接受黃教授錄音訪問，或對問卷調查提供書面答案。現在收集在這部書裡的，就是訪問的紀錄。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資助這項訪問工作的研究經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的出版使此書得以問世，我們均在此特別表示感謝。

這部口述歷史訪問紀錄最主要的意義，在於補充農復會的正式報告及檔案所未明言的部份史實，以盡力呈現歷史全貌，使當年農復會之精神與志業畢現其中，并存史實，以供切磋。舉例言之，一九四九年大陸局勢變化之際，農復會如何決定遷來台灣？這個問題在正式文獻上並未提及，在這部口述歷史訪問紀錄中，則有第一手的說明。再如張憲秋先生的訪問紀錄，娓娓道來，巨細靡遺，使過去數十年來他與其他同仁在農復會的工作經驗重現於字裡行間，極具史料價值。我們相信這一部口述歷史訪問紀錄的出版，對於研究光復後台灣地區農業發展史的朋友，應有相當大的助益。除了這部口述歷史紀錄之外，黃俊傑教授另編有《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史料彙編》，也另撰有《農復會與台灣經驗，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專書，都在今年由台北市三民書局出版，這三部書在性質上與內容上互為補充。惟歷史學家在史實以外所作之評論與申引與其對資料之選擇應用，就專業或技術人士或當年實際參與農復會工作的同仁看來，未必同意。讀者亦可比較閱讀及觀察，則對近四十年的台灣農業發展史可以獲得全面的瞭解。

歷史研究最重要是保存事實的真相。這部口述歷史訪問紀錄，所收錄的都是當年在農復會工作的資深同仁，所親身經歷的最翔實的證言，具有高度的價值。我們樂於向關心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發展經驗的朋友，鄭重推薦。

蔣彥士
謝耕中

中華民國 80 年 9 月 3 日

目 錄

序	蔣彥士、謝森中.....	1
王友釗先生訪問紀錄		1
朱海帆先生訪問紀錄		3
李崇道先生訪問紀錄(一).....		7
李崇道先生訪問紀錄(二)		17
李國鼎先生訪問紀錄		29
李登輝先生訪問紀錄		33
邱茂英先生訪問紀錄		41
馬保之先生訪問紀錄		47
陳人龍先生訪問紀錄		59
張訓舜先生訪問紀錄		65
張憲秋先生訪問紀錄		73

畢林士先生訪問紀錄(一).....	143
畢林士先生訪問紀錄(二).....	145
楊繼曾先生訪問紀錄.....	151
蔣彥士先生訪問紀錄(一).....	153
蔣彥士先生訪問紀錄(二).....	167
歐世璜先生訪問紀錄.....	171
謝森中先生訪問紀錄(一).....	183
謝森中先生訪問紀錄(二).....	195
謝森中先生訪問紀錄(三).....	201
附錄：關於農復會歷史的幾點看法..... 沈君山.....	205
索引.....	211

王友釗先生訪問紀錄

我唸台大農經系三年級時就曾參加農復會的實習，當時的助教是李登輝先生，畢業後分發到物資局。而後轉任農經系助教並參與農復會研究計劃。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出國回來後任教台大並兼農復會技正。一九六二年第二次出國回來後任台大副教授、教授。一九六六年農復會農經組缺人，由蔣彥士推薦到農復會任農經組組長。

早期農經組的研究，大多從事於較個體性的農業經濟方面的研究，以謝森中、崔永楫為領導人，主要做重要農作物個別生產成本及農家所得方面的調查分析工作。另與台大、興大的合作也多是屬於農業經濟方面的研究。而後自己做的研究大多注重整體性問題的分析，我同時於台大、興大任教，與兩校農經方面的教授均熟悉，因此開始綜合兩校教授，組成跨校的研究。這與早期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也因此漸涉及政策性的問題，奠定加速農建計劃的形成。加速農建計劃的內容大多由我草擬後與沈宗瀚先生、孫運璿先生討論，而後經國先生到中興新村宣佈實施。其實在此之前已有所謂GSP 計劃，而加速農建計劃的形成是經過朝野各方一連串討論，非憑空而降一夕之間倉促形成的。

從農業觀點來看，農復會成功之處是：(一)能將一般農業計劃與較科技化的理念結合。專家們到農村現場發掘問題，並可直接與各部會接觸，透過計劃來解決問題，而且專家們說話算數，這

點是非常重要的。在早期，計劃的發展空間大，除經費外各組的計劃不相衝突，但今日發展空間小，每一計劃均有其連鎖反應涉及他組，推動較難，因此計劃須有整體觀。(一)農復會不是中央機構，凡委員會批准的計劃就可執行，並不涉及政府法令，委員會批准了就是法律，因此很有獨立性。(二)農復會是中美合作機構，會內中、美委員均有，中國委員看問題較細；美國委員則較寬，因此對每個問題都看得很週到。農復會內有專家制度，專家能獨立作業。現在是屬政府機構，作法與農復會不同，如何互相協調是一大重點了。

至於農復會秘書長的角色主要是協調各組，瞭解各組工作狀況並將意見上達委員會，委員會討論通過後，由秘書長批交各組執行；行政上人事、交通等問題也都由秘書長負責處理，同時要與外溝通。故秘書長是協調溝通的靈魂人物。

農復會是中美政府合作成立的機構，目的在協助中國政府發展農業，使農業機構健全壯大，等到政府機構壯大不再需要農復會了，則是農復會成功之時。農復會培養人才出國進修，學成回來不是回到農復會，而是到政府農業部門幫助政府促進農業的發展，因此，農復會的極限是功成身退。由此觀點來看，農復會何來每下愈況之有？

至於農業援外，僅止於單純的技術層面，若較深之制度面，則涉及政治而有其實際實行上的困難。

(1989年8月11日王友釗先生訪問紀錄)

朱海帆先生訪問紀錄

「肥料換谷制」在當時是一種很巧妙的設計，它的背景因素有：(一)肥料供應不足。光復後所留下的肥料工廠都破壞不堪，肥料公司雖盡量恢復生產，但數量仍是不夠，而自己生產肥料的成本高，價格又貴，所以大部份均從日本進口，如硫酸銨是早已推廣使用，農民普遍接受而且價格便宜。當時用台灣蓬來米換取日本肥料。(二)糧食供應有困難。實行肥料換谷是切合需要，因政府若不能把握糧食，則隨時可能發生糧食供應不足問題，因此用肥料定量分配使家家戶戶都有肥料，不但政府可控制谷子向日本換硫酸銨，同時使得軍民有糧並可平衡米價，因此肥料換谷制在當時對安定人民生活有很大的關係。糧食局每年有農復會及美援會幫助買肥料，組織了「美援運用委員會相對基金會」由嚴前總統主持，並以農復會為主，生產機構（肥料公司）、配銷機構（糧食局等）等有關機構成立一個肥料小組，由沈宗瀚先生負責，牽涉的單位包括省政府、中央政府、經濟部。肥料小組的功能是每年開會決定肥料產銷的計劃並確定供需情形。由糧食局肥料運銷處執行，全省約有二八八個農會，由肥料運銷處將農民所需要之肥料綜合統計後，委託農會分配給農民，肥料換谷有一定的比例，如一斤谷子換一斤硫酸銨。當時的農復會是類似一種協調中心，以專業及產銷計劃與各機構配合。美援買進肥料，從港口下貨到倉庫、糧食局、省政府，中間有許多問題，總是開會討論解

決，若牽涉的單位少，則與有關單位開會討論；若牽涉範圍廣了，就召開大會，肥料小組會議每二個月召開一次，參加單位有美援會、肥料公司、經濟部、糧食局、農林廳、省政府及省交通處。

「肥料換谷制」的缺點在於：(一)肥料換谷的比例不公平，使得農民吃虧；(二)需填寫的表格很多，要求又嚴格，農民非常抱怨。因此，民國六十二年經國先生決定取消肥料換谷制，取消之前，農復會內部植物生產組張憲秋先生與農經組謝森中先生有過爭議，主要原因是，經濟專家認為肥料是自由商品，應該自由流通，而價格由自由市場來決定，政府不該加以管制。但在政府立場上，肥料在農業政策上不但要達到農作物增產改良品質的目的，並且，也是一種福利品，因為是福利品，所以肥料分配要達到三個目標：(一)全體農民無論遠近都供應無缺；(二)供應有時間性，農民按時可領到肥料；(三)價格統一，肥料的種類及數量都由中央政府統一規定。當時為了「服務到家」，僅從農會分送到各農家，就需要一億幾千萬，完全由省政府負擔。採行自由貿易，品質與價格均不能管理，若放手讓農民自由使用，肥料三要素中氮肥施用會過量；而磷、鉀則普遍不足，造成肥料使用不平衡，最後吃虧的還是農民，所以農復會希望能有肥料法來控制管理肥料品質。因此，若要肥料經濟自由化，須將所有條件都做好後才能實行，否則吃虧最大的將是農民。民國六十二年以後肥料換谷制雖廢除了，但肥料的產銷計劃仍然繼續在做，是一種計劃性的自由經濟。此外農復會當時也有修復堆肥舍的計劃，是與糧食局合作辦理，由農戶自己將堆肥舍修復，製造堆肥供農民使用。

農復會美籍委員菲平先生 (Mr. Fippin) 曾希望把農復會的

制度推廣到越南，可惜未曾實行。台灣以農業、輕工業、中小企業爲主的發展經驗，對東南亞國家可供參考，例如：海南島地理環境、氣候與台灣相似，而地形比台灣平坦，若能以台灣經驗去推展，效果可能更好。

（1989年8月7日朱海帆先生訪問紀錄）

李崇道先生訪問紀錄(一)

〈一〉農復會模式

農復會的模式對於發展中的國家很有貢獻，因為假如在已完全發展、開發的國家，其有關機構各方面的功能都很全備的話，我想相對地「農復會」型的機構可能發揮的功能將會減少很多。這是假定發展中國家的行政體系架構中有許多缺陷的地方，此種缺陷如要經過政治程序作行政機構的調整，尤其在所謂民主社會中，大概要很長時間；我們既等不及這樣的調整，時間又漫長，農復會這種機構的設置正很適合，可補其不足。這裡卻有個條件，就是當政者、首長、或即「上峰」，如何來接受與運用當時的美援，亦即政府如何能有一個寬大的胸襟，正確的政策，投入工作的赤誠，與信用學者來推動各項計劃。這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美援的提供者；一方面是美援接受者。雙方面都要有相對等的認識；綜觀美援所有受援國家，大多雙方功過無法相抵，而且往往過多於功。因為其經濟策略的運用如果不當，會打擊當地受援國家自己的農產品。尤其人事方面若缺乏宗教式服務的決心，來支援當地受援國家的話，美方專家兩年一任後就回美，只等於本身是公務員完成一個短期任務，也無法有重大的貢獻。為什麼假定上述這些條件呢？因為農復會本身功能幾乎超過農林部，對這種超部會的機構假如受援國家沒有這個雅量，怎能接受這樣的一個機構的設立，又如何來運用這種美援資助？當時總統蔣公如

果沒有這個遠見，怎能推薦蔣夢麟先生出來主持這個農復會？這個雅量是很大的。那時美援機構對農復會而言，雖是美援提供者，卻沒有完全的控制權，這時若完全擺出強勢者的姿態，要受援者聽話，將使政策受阻。農復會這一個五人委員會的架構，我覺得很能表現政策設計時，當事人很大的智慧和很高的遠見。因為提供援助必須謙虛，而接受援助需要很大的雅量，以技術為重，其間的架構包含甚多理念。而由這個層面來講，兩邊的當事人從上峰一直下來，必定要有這樣的架構與認同，農復會才能運作。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如此。我相信當時，因為我們剛剛抗戰勝利，很多事情要做，需要經援，更需要技術，農復會將技術與經援加在一起而以農民需要為重來運作——這種工作信念，也就是蔣夢麟先生說的：依據「農民需要的」(“the felt needs of farmer”)一種紮根的作法。因此，就國內外背景而言，當時需要經援，需要建設農業，而我們的政策當時在台灣因循發展農村而輕工業以至目前的重工業，這樣按部就班一路下來倒也非常切合實際，農復會在這點上是很適合而且有其貢獻的。農復會的許多基本哲學，應用於其他國家，依大多外國學者觀點，認為無法重複。我則常與國外學者及美援總署 AID 以前的成員爭辯，若你了解農復會的哲學，這類機構不是絕對不能在其他國家再建。我說：我不相信只有中華民國才能有這樣的成果。只要政府與工作人員有決心、信心、熱忱與正確的政策與工作方案來建設農村，為農民解決問題，這種經驗是可以重複的。

由農復會當時的組織架構，我們不得不佩服農復會先進們的先知。它有農林漁牧的技術單位，這些在此我暫且不講；此外農復會有水利，有農民組織，有家庭計劃，有土地組等各方面很多

其他單位。所以從土地政策、人口、家庭、農林漁牧、水利……，其涵蓋面實在很大。當初蔣夢麟先生、晏陽初先生、沈宗瀚先生以及很多先進，從生產到社會教育推廣等是整合的農村工作，所以它叫農村復興委員會，而沒有從農業、或農民、農家單一方向來定名。其實，農業、農村、農家、農民有很密切的連帶關係，但不是完全相同。晏陽初先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關於農民教育的推廣。大陸農村情形較落後，因此他從識字運動開始，因為不識字則無從推廣。但到了台灣，環境背景已經不一樣，在大陸識字運動的推廣與我們這裡有很大一段距離。沈先生是一個科學家，是一個專業的農藝學者，他著重生產方面。我在這裡要講的是，農復會歷年來變化過程中可能很多工作重點有所更改，但是基本的哲學迄未改變，仍舊存在於農復會的體制結構裡面。如衛生組的工作，基本上一直未變，人口或家庭計劃一直維持。雖然農民教育，自從晏陽初先生走後，似乎在各方面減弱很多，但是我們的農民輔導工作從家政開始、青少年輔導，一直到四健會，數十年來仍舊保持著。這種情形或許與改組後的農委會不一樣，因為如同農林部的部會組織其目標較單純，性質亦不同。所以，我認為農復會工作的推行是基於整體解決農業問題，而以技術為重。這樣的一個方式，相當特殊而複雜但很有效。再論農業推廣，不能為推廣而推廣，況且農業推廣教育人員也不可能樣樣都懂，一定要與生產技術專家相配合才可。此外，任何一個農業計劃單獨式的、點的突破，不能突破得太遠，不可能有很大的成就，非得受整體情況的牽制不可。可是整體建設面的前進卻是受個案計劃突破的、點的總和影響。農復會計劃自早年就是一個一個計劃按部就班地推動。俞國華先生以前常半開玩笑地批評我們

太小兒科，何不來一個大計劃？事實上沒這麼容易，農復會工作推行了相當長時間以後，才有四年計劃等長期計劃的研議。這種務實的策略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相當有效。事實上我們不能野心太大，一開始就來個大計劃。大計劃無從做起，必須以點為主的小計劃作起點，才能有效，才能直接對農民有所嘉惠。但小計劃推行到某個程度會受限制，等於打仗，一小戰役無法單獨突破整個戰線，點的突破到某個程度便無法前進。譬如針對某項生產著手，可是生產的東西會遭遇到分配的問題，可是我覺得我們的方法先從生產開始，這是對的。先賺了錢，再來談環境改善與農村的改革，這比較更為切實。先填飽肚子，等賺了錢，再改進生活，這裡面便有了先後順序。所以走沈先生所謂生產的策略還是對的，立即見效。蔣夢麟先生是學教育及哲學的，晏陽初先生也是教育家，沈先生的政策在台灣農業發展史上見到了效用。可是不能只講生產，只講科學，因為教育也很重要，而教育更是身、心各方面均兼顧，譬如農村四健會的工作雖然歷經很多困難，但是我們始終沒有放棄。

〈二〉風雨之中農復會的工作信念

我參加農復會的時候，會裡有兩種類型的工作人員：一是從大陸隨農復會來到台灣的人；一是在台灣當地加入的人。我屬於農復會一批在台灣較早加入的人。我早年是在南京農林部的中央畜牧實驗所服務，當時抗戰勝利不久，我們要在華南成立一個供應整個華南地區的獸疫血清的疫苗供應中心，美援方面也有一個很大的計劃準備支援，所以農林部派鄭榮祿博士（也是康乃爾大學出身）到台灣來主持這個計劃，他帶我一個人來，那時農復會尚未遷台。農復會來台灣後第一個計劃是：TWA-I（Taiwan